

话语的建构与实践： 以贫困叙述为例

王红艳◎著

HUAYUDEJIANGOUYUSHIJIAN
YIPINKUNXUSHUWEIL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话语的建构与实践： 以贫困叙述为例

HUAYUDEJIANGOUYUSHIJIAN
YIPINKUNXUSHUWEILI

王红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的建构与实践: 以贫困叙述为例 / 王红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6008 - 4

I. ①话… II. ①王… III. ①话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35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吴连生
责任校对 王影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69 千字
定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为什么关注贫困话语	(1)
二 理论准备	(15)
三 研究设计	(27)
四 研究价值与不足	(33)
小结	(35)
第一章 现行主流贫困话语的要义	(37)
一 西方贫困话语的变迁历程	(37)
二 现行主流贫困话语的要义	(42)
三 关于现行主流贫困话语要义的思考	(54)
小结	(62)
第二章 现行主流贫困话语的建构	(65)
一 文化维度的建构策略	(65)
二 历史维度的建构策略	(71)
三 科学维度的建构策略	(76)
四 政治维度的建构策略	(82)
小结	(88)
第三章 现行主流贫困话语的建构与实践:样本 I	(89)
一 中国扶贫开发:大致历程	(89)
二 中国扶贫开发:基本判断	(110)

小结	(122)
第四章 现行主流贫困话语的建构与实践:样本Ⅱ	(125)
一 库北县概况	(126)
二 库北县的贫困:在感受与话语之间	(128)
三 主流叙述在库北县:对三个中心概念的考察	(132)
小结	(168)
第五章 现行主流贫困话语的建构与实践:样本Ⅲ	(171)
一 库北村概况	(172)
二 主流叙述在库北村:对三个中心概念的考察	(178)
三 库北村的贫困:另一个维度	(201)
小结	(212)
初步结论与讨论	(214)
一 初步结论	(214)
二 讨论	(218)
参考资料	(231)
后记	(248)

导 论

近年来，伴随硬实力的稳步增强，我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提升，越来越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巧妙结合与相加使用。话语权是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发展和掌控话语权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选择。然而，发展和掌控话语权，不但要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支撑，还要懂得话语的本质，明白话语生产的流程，清楚话语分配的原则，知晓话语消费的机制，并且能够科学运用这些原理和机制。加强话语的建构和实践研究，意义重大。

一 为什么关注贫困话语

贫困话语指涉关于贫困问题的文本，包括贫困的定义、衡量贫困的标准、降低和消除贫困的策略与措施等内容（本书有时也将“话语”称作“叙述”，对应英文单词均是 discourse。关于话语的界定详见接下来的相关分析）。选择贫困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一是源自贫困线所引发的思考，具体而言，源自贫困线“权威性”与“局限性”之间的张力。二是来自文献阅读的冲击，既包括“不解渴”式冲击，也包括启迪式冲击。

（一）贫困线引发的思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娄趣（Seebohm Rowntree）以最低需要为基础计算了贫困线^①。自此，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贫困线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使用开来。在我国，自

^① Kuper Adam and Kuper Jessica, 1996,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Perinbanayagam R. S. 1991, pp. 655 - 656.

1986年6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该机构在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以及各地方配套机构成立以来，贫困线也开始得到使用。时至今日，贫困线已然成为贫困话语当中的关键词，经常见诸政府工作报告、学术研究报告等重要文献，更是官方划定援助范围、确定援助对象和评价减贫绩效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权威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笔者在农村调研中发现以下情况。

第一，贫困线作为一个经济指标，它不能标示出非经济因素。当我们依据这一指标划定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时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划定是不全面的或者不客观的。因为在这种划定中，我们没有去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贫困是显然存在的。在内蒙古R村的调研呼应了这种情况^①。如果按村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内蒙古R村并不是贫困村，但事实上这个村又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和乱村，因为它的社会公共资源完全处于一种非整合和匮乏的状态。而这种社区性贫困往往比经济收入的不足、不高更可怕。另一种情况是：也有不少村庄或农户的经济收入在所谓的贫困线之下，但是它或他的非经济资源却是丰裕的。在这种情形下，村庄仍然是活跃的和热闹的，农户也可能是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几乎不理睬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称谓。

第二，贫困线，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而且还是一个不全面的经济指标。贫困线强调收入而不重视支出^②，在描述现实状况时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如表1所示，如果仅仅计算收入，内蒙古R村居民CFW全家五口人在2005年的人均收入为2385元（即11925元÷5人=2385元/人），位于规定的贫困线之上，因而不属于政府援助的“贫困户”对象；但是如果将家庭所有开支纳入计算，这一家子2005年的人均收入出现了赤字（即-8575元÷5人=-1715元/人），因而又是R村居民一致公认的“困难户”。那么，居民CFW一家到底是不是“穷人”，是不是应该得到

^① 2006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笔者参加了世界银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合作课题——“走出贫困”的研究，在内蒙古进行了为期将近两个月的调研，其中内蒙古R村的调研时间为十天。居民CFW的家庭收入与开支情况即是这次调研获得的。

^② 从制度安排上看，国家统计局自1998年起使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双指标衡量一个农户是否属于贫困。但调研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各种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原因，地方上多数情况下还是使用收入指标来衡量一个农户是否属于贫困户。

援助？

表 1 内蒙古 R 村居民 CFW 家庭收入开支对照表（2005 年）

收入（单位：元）		开支（单位：元）	
CFW 外出打工	2000	CFW 腿摔伤治疗费	1800
CFW 在村里干瓦工活	—	妻子治疗乙肝医药费	1000
二女打工收入	5000	长女和儿子的学费	18500
种地 6 亩（黑豆、玉米）	1200	日常开支（含买大米、白面费用）	1000
土地转包 29 亩	725		
卖母毛驴一头（带驹）	3000		
合计	11925	合计	20500

结余：-8575 元（超支部分通过向银行、个体放贷者以及亲戚借款解决。另，因外出打工受伤，2005 年下半年 CFW 没能像往年那样在村里干瓦工活挣钱）

第三，贫困线，因为是以人均指标为标示线，它在贫富差距较大地区的使用往往会导致这么一种风险：贫困在数字上被拉平了或化解了，而事实上依然存在（可能是大批的）“需要援助”的贫困人口。因为在极端值比较多的情况下，平均数是难以反映数字全面的具体的分布情况的。换句话说，生活在富人较多村庄的低收入人群很有可能会被遗忘在政府扶贫开发计划之外。

上述三种情况表明，贫困线在检测和解释现实贫困时表现出相当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无疑对其科学性和权威性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我们不但使用了贫困线，而且接受了以它为标尺划定的“贫困现实”。这就引出了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线会有如此巨大的功效？贫困线或者其他叫作什么线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叫法对我们现实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贫困问题研究的经典视角

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启动了文献研究程序，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的学术资料。尽管这些研究没能清楚回答本书提出的问题，但是其中价值仍然值得珍视。文献研究了解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概而言之，主要涉及贫困

的概念、贫困的类型、贫困的测量、贫困的发生（包括再生和代际传递）、扶贫政策的变迁、扶贫绩效评估以及减贫对策的研究等。本书在此以贫困的类型学、贫困的发生学、关于贫困的行动实践为分析维度，同时选择其中一些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成果为代表，尝试呈现研究成果的总体情况。^①

1. 关于贫困的类型学研究

贫困的类型学研究主要包括贫困的概念、贫困的类型、贫困的测量等几个具体议题，而这几个议题在逻辑上也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贫困概念的研究。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受到国外贫困理论研究成果和扶贫减贫实践的影响，国内关于贫困概念的界定也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经济单维视角到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在众多相关研究中，郭熙保等对贫困概念的演进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们指出，最初人们只是从收入和（或）消费的角度来定义贫困，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能力贫困，而时至90年代人们更是开始关注包括脆弱性、社会排斥等更为宽泛的权利贫困。他们认为，贫困概念的演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不过，这些贫困概念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的。^②

关于贫困类型的研究。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贫困概念界定的变化，贫困类型划分经历了一个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关注和使用的还是收入贫困这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例如，2001年，胡鞍钢等在提出了“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概念，提请人们除了关注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以及以寿命、知识水平和生活体面程度为基本要素的人类贫困（human poverty）之外，还必须关注这一种伴随21世纪而来的新型贫困。因为知识贫困将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知识贫困指的是获取知识能力的贫

^① 这个分析框架借鉴了学者沈红和罗遐的研究成果。详见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91—103页；罗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学术界》2007年第6期，第247—257页。

^② 郭熙保、罗知：《论贫困概念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第38—43页。

困、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以及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知识指的是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信息与网络等广义知识^①。时至2009年，胡鞍钢等在对青海案例进行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四类贫困即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及生态贫困，并构建了一个由四类贫困17个指标组成的贫困综合定量测算体系^②。

另一关注角度是：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贫困类型的出现和分布发生了变化。以贫困发生区域为依据，我们可以将贫困划分为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不少研究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国企改革等因素的影响，下岗人员增多，城市贫困发生率出现增高趋势。至此，中国贫困问题呈现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的局面。不过，夏庆杰等的研究成果没有支持这种判断。他们利用我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对1988—2002年我国城镇绝对贫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估计和评价，继而发现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即1988—2002）中国城镇贫困都在显著减少^③。我们还可以依据贫困程度将其划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类型。不少学者从这个视角出发对我国贫困类型的历时分布问题展开了一些研究。以林卡、范晓光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我国贫困类型经历了一个三阶段式的演变过程：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绝对贫困（改革开放前）→以区域贫困为焦点（80年代以来）→由社会阶层分化造成的相对贫困为核心（9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指出，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即是相对贫困问题。^④

关于贫困的测量。伴随贫困概念以及贫困类型划分依据的演变，贫困测量也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关于贫困标准（或者称贫困线）的介绍和讨论是这一范畴的重要内容。因为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以及贫困地区的重要工具。包括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

^① 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70—81页。

^② 胡鞍钢、童旭光、诸丹丹：《四类贫困的测量：以青海省减贫为例（1978—2007）》，《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45—52页。

^③ 夏庆杰等：《中国城镇贫困的变化趋势和模式：1988—2002》，《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第96—111页。

^④ 林卡、范晓光：《贫困和反贫困——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87—94页。

困指数在内的三类贫困标准,是目前反映人类贫困最为成熟的方法^①。从研究兴趣变迁轨迹来看,在我国关于贫困标准主要围绕两个话题展开。

一是关于贫困线的维度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唐平为代表的人士认为,应该使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因为这一指标“比较简单和容易操作”^②。90年代中期,以童星、林闽钢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当时)贫困线的单维性表示了质疑。童星、林闽钢根据农户生活的实际状况划分出五种不同层次,继而基于五种不同生活层次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标准线:特困线(也称活命线)、温饱线(也称贫穷线)、发展线(也称脱贫线)、小康线和富裕线。他们主张使用特困线、温饱线和发展线来取代(当时)政府所使用的单一贫困线,以期全面反映农户生活的实际层次与差距^③。类似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在此不再罗列。

二是关于贫困线的额度选择问题。以顾昕、陈宗胜等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贫困线低于国际贫困线,这一情况可能影响我国对贫困现实的准确判断以及扶贫减贫政策的科学制定。顾昕发现,无论从绝对贫困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贫困线都是相当低的。继而,鉴于我国现行贫困标准所依据的是绝对贫困理论,关注的主要是人的基本生存问题,顾昕建议我国政府在确定贫困线时还应该借鉴国际上关于相对贫困研究的理论,重新制定更加科学的标准和合理的额度^④。陈宗胜等也认为,我国政府现在执行的贫困线仍是一条绝对贫困线,无法追踪贫困的动态变动状况。继而,陈宗胜等也主张要重视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建议以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为基数,按照特定均值系数计算出一条“相对贫困线”,以确保贫困线的变动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同

① 王小林:《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55期,第41—50页。

② 唐平:《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和贫困状况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6期,第39—43页。

③ 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8—87页。

④ 顾昕:《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51—62页。

时确保以一个适当高的扶贫标准切实帮助贫困人口^①。但以王萍萍等为代表的人士则认为,我国同时使用农村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分别衡量极端贫困和贫困状况既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也是符合我国农村贫困实际情况的。不过,王萍萍还指出,贫困标准势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而改变,而基于我国现阶段贫困现状和扶贫实力,我国政府在着力于解决剩余贫困人口脱贫的同时,可将低收入人口正式纳入扶贫对象,发达地区在确定区域内扶贫济困对象时则可试用更高的援助标准。^②

2. 关于贫困的发生学研究

关于贫困发生原因和机制的研究,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三种传统的解释框架:结构取向的解释、文化取向的解释、自由/可行能力取向的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结构取向的解释占据主要位置;60年代之后,文化取向的解释逐渐兴起。至于为什么在60年代发生从结构取向到文化取向的转变,本书认为,可从社会理论的发展演变进路这个视角加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理论发展史就是“帕森斯帝国”的沉浮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60年代初期,是西方历史上最稳定和最具有乐观主义情绪的时期之一,热衷以美国为例描述“成功现代性”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红极一时;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尤其是60年代之后,伴随对福利国家乐观主义情绪消失,帕森斯理论的霸主地位逐渐受到多方挑战,文化理论应运而生并成为后帕森斯理论的主要流派^③。自由/可行能力取向的解释框架的使用则大致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走红”之后的事情^④。

结构取向的研究强调,贫困是社会力制造的不平等或经济力制造的失业所导致的。这一取向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马克思(Karl-Marx)。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奥科克(Pete Alcock)、伦斯基(Gerhard Lenski)等的成果影响较大。奥科克认为,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以伦斯基为代表的冲突学派则强调,贫困和不平等是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

① 陈宗胜等:《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第67—78页。

② 王萍萍:《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调研世界》2007年第1期,第5—8页。

③ [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贾春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④ 阿玛蒂亚·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①。文化取向不再讨论阶级和机会问题,转而关注穷人能力或者说竞争力问题,认为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因为机会的缺乏也不是因为经济合理性的缺乏,而是因为穷人存在文化和心理障碍^②。这一取向包括贫困文化理论以及情境适应理论两个分支。刘易斯(Oscar Lewis)是贫困文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影响广泛。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情境适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影响深远。自由/可行能力取向代表自然是森。森主张从可行能力的视角讨论贫困问题,即要按照人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他建议人们应该把贫困看作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还指出,从收入剥夺这一视角看待贫困问题,认为教育、医疗保健等是减少贫困的良好工具,恰恰混淆了手段和目的。^③

将各种关于贫困研究的理论划分为三种或者几种取向,显然只是一种相对处理办法。因为取向之间在逻辑上始终是有关联的,在内容上多少是有交集的。各种取向本身也有一定局限性。例如:结构视角的解释大多机械看待结构作用,忽略了人作为主体的自有能动性;文化视角的解释,尤其是贫困文化理论流派,表现出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色彩;自由/可行能力取向的解释试图超越结构与文化,但是必定遭遇“有心无力”的局面。不过,这些相对性和局限性丝毫不影响这些范式在后来研究中的使用。

我国学者在进行贫困发生原因和机制研究时大多没有超越上述三种取向,不过不少学者还会加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资源分布的差异性等维度的考察。大致说来,认为我国贫困人口产生主要是由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造成的“社会转型说”、认为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生产力的欠发展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的“生产力低下说”、主张从政府梯度发展战略视角考察贫困成因“梯度发展说与反梯度发展说”、

① 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49—50页。

② Lawrence M. Mead, 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③ [印度]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贇、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认为资源匮乏和资源分配不公是致贫主要原因的“资源要素说”、主张从资源分配权与社会保障权利和就业机会视角考察致贫原因的“权利缺失说”以及强调贫困产生的社会性风险之原因的“社会风险与社会支持网络欠缺说”大体属于结构取向的解释。侧重于强调文化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吴理财、阎文学、王兆平等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尝试^①。至于森的自由/可行能力取向视角的解释框架,从可获得资料来看,国内研究成果可能仍然停留在介绍层面^②。而总体说来,尝试对贫困问题作“综合性”研究既描述贫困现象,又分析致贫原因,还讨论减贫对策的成果居多。^③

3. 关于贫困的实践行动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就比较重视贫困的实践行动研究。近年来,重视实践行动研究的倾向愈加明显。具体而言,主要兴趣集中在扶贫减贫成效评估以及扶贫减贫对策建议检讨等方面。

就关于扶贫减贫成效评估的研究而言,李小云、程永宏等团队的定量分析值得关注。李小云等利用2000—2008年各省的经济增长和贫困数据对我国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依然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有三个情况值得关注:一是贫困减少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各区域在经济增长速度、贫困减少速度以及贫困发生率对人均GDP的弹性三个指标上存在明显差异;三是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部门的增长仍然具有较高的减贫效应^④。程永宏等采用拟合收入分布函数的方法,在计算出改革以来我国城乡以及全国的绝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率基础上,发现两个趋势:一是改革以来我国的绝对贫困率快速下降,但绝对贫困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二是相对贫困率呈现出持续上

^① 罗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学术界》2007年第6期,第247—257页。

^② 马新文:《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与方法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69—74页。

^③ 例如: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三贵等《技术扩散与缓解贫困》,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安树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症结与出路》,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任福耀、王洪耀《中国反贫困理论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卓《中国贫困人口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④ 李小云等:《200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2010年第4期,第4—11页。

升的趋势,并与相应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高度一致。^①

魏后凯、邬晓霞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等原因,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的局面。其中,农村贫困大致状况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继续下降,但减贫速度放慢;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重点扶贫县和粮食主产区;农村特殊群体贫困发生率较高,“三无”农民(“三无”指的是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已经成为新的贫困群体。城市贫困大致状况是: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②

就扶贫减贫对策建议检讨而言,都阳、蔡昉、徐月宾、朱玲等学者的观点颇有前瞻性,他们的不少建议也为我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所采纳。早在2005年,都阳、蔡昉就指出,一方面,我国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开发式扶贫的资金使用效果也不再显著。因此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已不宜继续通过开发式扶贫的方式摆脱贫困,而应进一步细分贫困群体,并根据不同群体实施不同的扶贫措施,同时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扶贫战略再次重要转移^③。

2007年,徐月宾等利用2004年农村住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特征和致贫因素以及评估了社会救助政策的效果之后发现,开发式扶贫政策已然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它对于地域和贫困人口劳动能力的依赖,使得其对于剩余贫困人口的政策边际效益几乎等于零。基于此,徐月宾等认为,重构农村反贫困政策已然势在必行,主张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要从社会救助转向社会保护,提出了由“普遍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选择性社会救助制度”以及“新型开发式扶贫政策”组成的被称作“四驾马车”的反贫困政策框架。^④

^① 程永宏等:《改革以来中国贫困指数的测度与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第26—33页。

^② 魏后凯、邬晓霞:《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56—68页。

^③ 都阳、蔡昉:《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5期,第2—9页。

^④ 徐月宾等:《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40—53页。

2011年,朱玲在梳理中国扶贫战略包括具体政策工具的变化,以及城镇、农村两条各具特色的扶贫路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扶贫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她指出,我国现阶段发达地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低保、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协调起来而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我国贫困地区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将低保、民间救助和扶贫项目的衔接起来而更好地提升减贫成效。但是,不管是当前还是今后,增强贫困地区的减贫行动有效性始终是我国消除极端贫困的关键。为此:其一,要增加中央政府向贫困地区低保项目的拨款,以使所有的极端贫困家庭和个人获得生存保障;其二,在对极端贫困群体的经济风险实施综合干预措施的同时,政府和公众还需采取消除社会排斥的公共行动。相应地,必须调整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不再过分关注贫困发生率的变化,而要着重观察贫困人口受益于多维干预政策的程度。^①

(三) 国内相关话语研究的兴起

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发现,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涉及话语问题。相对国外研究进展而言,话语研究在我国的出现以及兴起较晚,基本是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几年的事情。国内关于贫困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话语研究成果,既是启发笔者选定研究方向的重要源泉,也是激发笔者将贫困话语研究继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基础。

1. 关于贫困话语研究

黄平可能是国内较早关注贫困话语研究的学者。2000年,黄平在讨论发展主义问题时指出,只是在发展主义的话语框架内,才在理论上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政策上有了减贫计划和扶贫项目^②。时至2003—2004年,朱晓阳加入此行列。朱晓阳在研究成果中指出,我国的贫困和反贫困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一种政治性的建构有关,而并非单纯地对我国农民热量大卡计算。在他看来,现行的贫困话语体系是以僵硬教条的个体主义为价值,以工具理性作为“穷人”达到幸福的行为准则,以伪装的或直白的现代性直线发展观为脱贫的目标的。更进一步,

^① 朱玲:《应对极端贫困和边缘化: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7期,第27—34页。

^② 黄平:《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天涯》2000年第1期,第37—39页。

反贫困话语体系将“贫困群体”设想为一个“第三世界”的“他者”，它所谓的针对目标群体的反贫困实际上是一种管制穷人的战略。基于这一情况，朱晓阳主张，反贫困首先要反的是反贫困者的“贫困话语”，要将所谓“贫困群体”从目前的殖民化的贫困话语中解脱出来。^①

新近出现的值得关注的关于贫困话语研究的成果当属罗江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村贫困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罗江月侧重于考察我国政府在贫困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所发挥的能动性作用。她认为，由政治道德、官僚结构和专家知识所构成的机制实质上是一台“生产贫困”的机器，这台机器的存在和运作使得“贫困”一直存在。而在“贫困形象”被生产出来以后，国家还通过扶贫的道德化和扶贫的科层化对此进行了（着）反复再生产。其中，扶贫道德化指的是政府通过一系列话语构建自身与贫困群体、甚至全体公民之间的道德关系的过程。扶贫的科层化包括扶贫目标与对象的确定、专门的机构的设置和专门人员的安排以及相关工具和制度的出台和实施。至于为什么国家要生产和再生产贫困，罗江月的回答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发展纲领的转变、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深入，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转移。为了应对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危机，政府构建了相应的扶贫话语、制度和机构，以修补转型时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可能出现的断裂，调整政党的代表性与国家的中立性，并平衡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②

2. 关于相关话语研究

从国外话语研究发展状况来看，话语研究似乎对弱势/边缘群体、热点问题等表现出“天然的”偏好。这一偏好在国内话语研究中也得到体现。近年来，与贫困问题相关的议题即女性问题、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民族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等逐渐进入了研究视野。尽管成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已有一个良好开端。

关于女性问题的话语研究。例如，揭爱花关注了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两套话语之间关系。在考察两套话语变迁历史基础上，她指出，女性话语能否确立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能否将女性立场、权利诉求渗入

^① 参见朱晓阳《在语言“膨胀”的时代再谈“参与式”的内在困境及补药》，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刊《自立》2003年第3期；朱晓阳《反贫困的新战略：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到管理穷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98—102页。

^② 罗江月：《中国农村贫困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知网博士论文库2014年版。